

南開大學出版社

賦

詩

雜著

文章盛衰，與世升降。唐之文風大振於貞元、元和之間。韓柳倡其端，劉白繼其軌。當時學者，涵濡游泳，攬其英華，洗濯磨淬，輝光日新。苟有作者，皆足以拔出流俗，自成一家之語，則吳興之文是已。

肖占鵬 李勃洋 校注

沈下賢集校注

I214.22
25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資助出版

肖占鵬 李勃洋 校注

沈下賢集校注

南開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三年·天津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沈下賢集校注／(唐)沈下賢著，肖占鵬校注．—天

津：南開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三．十二

ISBN 7-310-02030-8

I．沈… II．①沈…②肖… III．①古典詩歌—作

品集—中國—唐代②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國—唐代

③沈下賢集—注釋 N．1214．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二〇〇三)第一〇五〇八六號

出版發行 南開大學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南開區衛津路九四號 郵編：三〇〇〇七一

營銷部電話：(〇二二)二三五〇八三三九 二三五〇〇七五五

營銷部傳真：(〇二二)二三五〇八五四二

郵購部電話：(〇二二)二三五〇二二〇〇

出版人 肖占鵬

承印 天津新華印刷二廠印刷

經銷 全國各地新華書店

版次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印次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開本 八八〇×一二三〇 三十二分之一

印張 十一．一二五

插頁 四

字數 二五〇千字

印數 一一二〇〇〇

定價 三十八圓

前言

沈亞之，字下賢。生卒年不詳，大約生於唐朝代宗末、德宗初（公元七八〇年左右），卒於大和五年（八三一）之後一兩年。兩《唐書》無傳。現存有關他的歷史記錄，如兩《唐書》之《栢耆傳》、計有功《唐詩紀事》卷五十七、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袁州本卷四中（衢州本卷十八）、辛文房《唐才子傳》卷六等，亦多爲隻言片語。《新唐書》卷二〇一《文藝傳敘》云：「若韋應物、沈亞之……等，其類尚多，皆班班有文在人間。史家逸其行事，故弗得而述焉。」儘管如此，根據對現存《沈下賢集》十二卷本詩文中事實線索的考辨，結合史書相關記載，亦可見出其生平之大概。

沈亞之，吳興人，生於隴州汧源縣。幼年徙居長安，大約在二十餘歲時回到故鄉吳興。元和三年（八〇八）曾短期在夏州爲刺史李愿之幕賓，後重回家鄉。元和五年（八一〇）起應進士科考試，數次落第，往來轉徙數州以求貢解。元和十年（八一五）進士及第。及第後赴涇州，爲涇原節度使掌書記。短短兩月，因節度使李勣卒而離職回到長安。後曾任將仕郎守秘書省正字。此後數年間不獲職任，往來各州

之間，生活困頓。長慶元年（八二一）應制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考試，不中。次年，任櫟陽尉。長慶四年（八二四），遷福建等州都團練副使之職，任職大約三年。大和二年（八二八），再次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考試，仍不中。大和三年（八二九），以殿中侍御史爲判官，隨德州行營諸軍計會使栢耆至滄州，平李同捷叛。栢耆獲罪，亞之亦被貶官虔州南康尉。大和五年（八三一），量移郢州，爲司戶參軍之職。同年秋天，染疾，大約于此後一兩年間去世。關於沈亞之生平事迹的詳細考論，筆者另作《沈亞之年譜》，所記較詳，附錄于本書，此不贅述。

沈亞之父祖已不可考，然其吳興沈氏家族亦爲名門望族，本以文學選官，自德宗朝始以代宗睿真沈皇后之故，得以外戚身份致身通顯。族中多有與皇室或達官貴宦聯姻者。沈亞之即曾在《送叔父歸觀序》（《沈下賢集》卷九）中說：「我儒世家也……」唐代文學史上的著名人物沈既濟、沈傳師（及沈述師）父子，即爲沈亞之之族祖、族叔。

亞之文名在文學史上並不隆盛，但是，其才情筆力卻自有獨到之處，在中唐文人圈中也有一定的影響，《唐才子傳》卷六《沈亞之》中云：「（亞之）嘗遊韓吏部

門。杜牧、李商隱俱有擬沈下賢詩，蓋甚爲當時名輩器重云。」惜乎生平行事流傳甚少，似漸有爲歷史遺忘之勢。《新唐書·文藝傳》「取以文自名者爲《文藝篇》」，「若韋應物、沈亞之、閻防、祖詠、薛能、鄭谷等」，儘管「皆班班有文在人間」，終以「史家逸其行事」而不得傳。宋代姚鉉在纂修《唐文粹》時也只選了亞之的三封書信（《上李諫議書》、《上冢官書》、《與孺顏上人書》）和一篇紀事（《李紳傳》）。

儘管李商隱作過《擬沈下賢》詩，杜牧、賈島、張祜、李賀等詩人也與沈亞之有文學交往，儘管今天的文學史中一提到沈亞之，必先提及他的傳奇小說創作，然而，《沈下賢集》十二卷所收錄的，絕大部分均爲散文作品。仔細閱讀一下這些雜文、書信、記、序、墓誌以及應試時所做的策問等散體文，我們就可以發現，除了其藉以傳世的《〈湘中怨〉解》、《秦夢記》、《異夢錄》等傳奇作品之外，沈亞之的散文創作其實頗有可觀者。無名氏《沈下賢集》元祐丙寅題記中就曾如此評價：「文章盛衰，與世升降。唐之文風大振於貞元、元和之間，韓柳倡其端，劉白繼其軌。當時學者，涵濡游泳，攬其英華，洗濯磨淬，輝光日新。苟有作者，皆足以拔出流俗，自成一家之語，則吳興之文是已。」

一個文人的創作風貌，脫離不開他所處的文學背景。建中元年（七八〇），唐王

朝「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制舉考試中的制策和對策自唐建國一百五十年來首次改用了散體文，這一看似微小的變化，折射出的問題卻非同小可，它喻示着唐代統治階層的文學趣味在文體上已經由駢體文向散體文傾斜，已經在某些應用文體中追求簡潔實用、擯棄浮華與藻飾。而沈亞之，正是誕生在這一文壇風氣變革之際。他生活的中唐時期，更是韓愈所倡導的「古文運動」興起之時。在《送韓北渚赴江西序》（卷九）中，沈亞之自言「嘗得諸吏部昌黎公，凡遊門下十有餘年」，十年師生般的交往使他在文學創作上秉承了韓愈的很多風格特徵——強烈的現實政治色彩、文風的質實、語言藻飾的怪奇險崛以及小說中情節構思的獨創性等等方面，都可以找到韓愈的影子。當然，從另一方面講，在沈亞之生活的年代，科舉考試中對詩賦的考察仍在強調辭藻的雕琢與聲韻的和諧，沈亞之在文章中不止一次地對這個問題表示過自己的不滿：

去年始來京師，與群士皆求進。而賦以八詠，雕琢綺言與聲病，亞之習未熟，而又以文不合于禮部，先黜去。（卷八《與京兆試官書》）

今吏部之補吏，歲調官千餘，其試以偶文儷語之書程……（卷十《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策長慶元年》）

儘管社會文風已經發生了相當大的轉變，但科舉考試這根文學的指揮棒仍不可避免地影響着當時文人的創作風貌。這種質與文、簡與繁的矛盾在沈亞之的文章中也時有體現。但綜觀其散文創作，仍有著鮮明的個性特徵。

其一，是貫穿於沈亞之文字之中強烈的史家意識以及「文以明道」的文學觀念。中國文人歷來具有深厚的史家情結，「修國史」更是士人莫大的榮耀，而這種情結的實質，歸根結底來自於儒家思想中明道輔教的功利主義文學觀。無論是孔子論詩可以興觀群怨，還是司馬遷論史可以明道辨紀，其本質都是強調文學作為工具的一面。士人著史、作文的目的，根本上在於通過記錄歷史事件而鑒古知今、鑒往知來，從中傳達一定的思想觀念，達到道德教化的目的。韓愈的「古文運動」，其核心就在於「修其辭以明其道」的文學思想，因此，深受昌黎公影響的沈亞之乃明言「余尚太史公言，而又好敘義事」（卷四《馮燕傳》），「今亞之雖不肖，其著之文，亦思有繼於言……由是旨《春秋》而法太史，雖未得陳其筆，於君臣廢興之際，如有義烈端節之事，輒書之，善惡無所回」（卷八《與京兆試官書》）。

在這種文學觀念的指引下，沈亞之創作的很多散文作品均具有「著史迹、備史聽」和「文以明道」的雙重寫作目的。除去功用明確的題記、墓誌、行狀等文體的

文章外，他創作的《夏平》（卷三）、《旌故平盧軍節士》（卷三）、《萬勝崗新城錄》（卷三）等等均可謂優秀的歷史散文。他也在多篇文章中明白地道出了自己創作時的著史心態：

故悉以論著，將請於史氏云。（卷三《旌故平盧軍節士》）

時某客壽春，得詳其語而書之，以備史聽。（卷三《萬勝崗新城錄》）

惜其終莫有能繼其聲者，故余著之，欲其聞於後世云。（卷五《歌者葉記》）

而其忠實地記錄事件以備史聽的創作態度也獲得了時人的認可，《杭州場壁記》（卷六）記道：「或謂亞之學史，詞無苟，故用是記焉。」沈亞之身後，他的很多文章或為後人著史提供了寶貴的資料（如《旌故平盧軍節士》通篇對歷史事件的詳細記述、對人物群像的刻畫），或可與正史互證互見，以補史闕（如卷四《歌者葉記》中對趙壁、李元憑的提及；卷八《上九江鄭使君書》中關於陳子昂「死于枉，皆由武三思嫉怒於一時之情，致力尅害」的記述；同卷《與潞州盧留後書》中對方士李元戢恃寵橫行的記述）。

此外，他的衆多散文還在記敘事實的基礎上，傳達出自己對事件、時世的思考認識以及鮮明的倫理判斷，顯示出強烈的功利主義文學觀念：

今世或有邦有土之臣，專心聚斂，殘割饑民之食，以資所欲。忍其死而不愧，受刑辱而無恥，是亦不仁甚矣。終無有惡者。郭常之賤而行之，又焉得不稱於當時哉？（卷四《郭常傳》）

今夏北一方也，得其平如此，豈在位者而知周公之道耶？乃藉所以於篇，以明善理云爾。（卷

三《夏平》

嗚呼！淫惑之心，有甚水火，可不畏哉！然而燕殺不義，白不辜，真古豪矣！（卷四《馮燕傳》）

其二，沈亞之的作品文風質實，敘事簡潔有力，同時不排斥對文字之美的追求。追求文字的簡潔準確、典重質實是中唐以來唐代文學的重要變化，反對「雕琢綺言與聲病」的沈亞之在順應這一潮流的同時，更能力避矯枉過正，在文章中適時、適度地保持著對文辭之美的追求。因此，在他的作品中，我們既可以看到簡潔有力、形象生動的語言，如《旌故平盧軍節士》等記事散文，也可以看到說理嚴密、真切生動的文句，同時也有根據敘述需要駢散結合、講究用辭藻飾的文字，比如他的策論、書信等作品。在這裏，對文字形式上的追求是服務於論述內容的需要的。

孫犁在《讀〈沈下賢集〉》一文中說：「唐人紀事，一出天然。樸實無華，而真情畢見。作者能用最簡練的文字，表達人物最複雜的心理。不失其真，不失其情。」

讀者並不覺得他忽略了些什麼，反而覺得他擴充了些什麼。」並以《馮燕傳》為例說明：

燕伺得間，復偃寢中，拒寢戶。嬰還，妻開戶納嬰，以裾蔽燕。燕卑躡步就蔽，轉匿戶扇後，而巾墮枕下，與佩刀近。嬰醉且瞑，燕指巾令其妻取，妻取刀授燕。燕熱視，斷其妻頸，遂巾而去。

這是一個非常緊張的場面，他祇用了六十九個字，寫了三個人物在這一危險時刻的舉動、心理、感情。其中「燕卑躡步就蔽」六個字，寫得活靈活現，人物情狀，如在目前。

此種「活靈活現」、「如在目前」的筆法在亞之文章中俯拾即是。《李紳傳》中更是寥寥四十字就將李紳避禍作偽時的神態、動作傳神地摹畫了出來：

急召紳授紙筆，令操書上牘。紳坐錡前，佯惴怖，戰管搖紙，下劄皆不能字。輒塗去，累數十行。又如是，幾盡紙。

其三，文章追求獨創性，多怪奇險崛之語。如卷一《古山水障賦》中的這一描寫：

于是瀕以長瀾，森以怪木，瑟汨慄颼，淒煩蕩燠。浸平滌於楚澤，冶妖韶於陽谷。低霾橫暝兮陳半腹，夢雨神雲兮澹而不歸。

短短數句之間，既摹像寫形，又繪聲傳情，更有典故的使用含嵌其中。特別是在動

詞和形容詞的使用上，亞之窮極煉字之功，字字取之意外，卻又字字不離意中，推敲琢磨得既准且險，無怪乎魯迅在《唐宋傳奇集》稗邊小綴（一）四中說：「亞之好作澀體……」《四庫全書總目》也稱「其文則務爲險崛，在孫樵、劉蛻之間」。沈亞之「追求獨創」、「澀」及「險崛」的文風，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緣於他多年汲汲科舉的經歷——他在《答馮兄書》（卷八）中自言：「昨日奉策應對之日，操意張謀，唯恐不遠，刻文勵語，唯恐不工。思欲不肩於俗，以爲世之大寵。」儘管「雕琢綺言與聲病」並非他之本願，但以文字的新穎險奇來引起關注、謀求仕進之機，則是他無法不面對、無法不順從的文學現實。而另一方面，他的文風則是受與他過從甚密的韓愈、李賀等人的影響。除了前文提到的沈亞之遊韓愈門十有餘年（韓愈的文學特點此不贅言），他還自元和五年起與李賀交往。李賀的詩風向以獨創特出、專尚奇詭著稱，在《叙詩送李膠秀才》（卷九）中，亞之贊李賀曰：「余故友李賀，善擇南北朝樂府故詞，其所賦亦多怨鬱淒豔之巧，誠以蓋古排今，使爲詞者莫得偶矣……」對李賀的評價，很多其實也正是亞之文學的最大特點。

其四，亞之爲文，善於體物之情，也就是他在《爲人撰乞巧文和史館陳學士作》（卷二）序中所說的「善感物態」。所謂「體物」、「感物」，既是強調文學創作者對

客觀現實和事件的捕捉和感受能力，其內裏更是在強調創作者在「能感」、「有感」之餘，具備用文字去形象、準確、感人地將這種感受傳達給讀者的能力。優秀的作品正是在這一過程中產生的。他在《敘草書送山人王傳乂》（卷九）中明白地解釋了自己的這種理論見解：

夫匠心於浩茫之間，爲其爲者，必有意氣所感，然後能啓其象也。此凡一舉志則爾，而況六藝之倫乎？余聞之學者曰：「昔張旭善草書，出見公孫大娘舞《劍器》渾脫，鼓吹既作，言能使孤蓬自振，驚砂坐飛，而旭歸爲之書，則非常矣。」斯意氣之感與？今山人王傳乂……爲余題《旌故平盧軍節士》文，因感之聳髮寒肌，謂吾友生曰：願欲余敘其書。意者豈余之文以感王生之志於鼓噪劍氣之勢乎？

亞之此處所言之「氣」似乎又是上承韓愈之說——昌黎公在《答李翊書》（《韓昌黎全集》卷十六）中談到自身性情之「氣」，指人能夠感受到事件、藝術中所具有的感人之質素的能力。沈亞之得聞高鉢（沐）、郭昞等人事迹而「意氣所感」，經過創作形成有感染力的文字；王傳乂復爲其文所感，「聳髮寒肌」，因作之書。而亞之《湘中怨》解、《秦夢記》等藉以成名的小說作品之所以能夠寫得窈窕淒幽、動人於無聲，亦是其能「體物之情」——聞太學鄭生的故事而爲其情事所感，至橐泉秦宮而爲

思古之情所感——的結果。

其五，構思奇婉。這一特點主要是針對沈亞之的小說作品而言的。亞之文字中聲名最著者，當推《湘中怨》解、《秦夢記》、《異夢錄》等傳奇作品，文學史上因此有徑直稱其為「小說家」者。魯迅對其傳奇頗為看重，《中國小說史略》第八篇《唐之傳奇文上》稱其「皆以華豔之筆，敘恍惚之情，而好言仙鬼復死，尤與同時文人異趣」；沈亞之《為人撰乞巧文和史館陳學士作》序中則說：「其夫以為沈下賢工文，又能創窈窕之思，善感物態……」在此，亞之這幾篇作品的情節不必詳述，究其核心大意，皆是寫人神偶遇及人神相戀的情節，皆是「不識——相識——分離」的情節演進模式，所鋪陳、展現的，還是中國文人古來已有的遇仙（尤其是女仙）幻想，或者說是遇仙情結。但是，同樣的情節模式之下，之所以說沈亞之的作品「構思奇婉」、「能創窈窕之思」，其根本在於沈亞之能夠在表達情節之餘，依靠自己對事物情態的感悟能力和出眾的文才，為作品增添幽美感人的詩歌，對一些畫面感強的場景進行濃墨重彩的鋪陳摹寫，對人物在重要時刻的情緒、動作、表情、語言等特徵準確描繪，同時加以適度的情緒化渲染。所有這些，都是能夠調動、激發讀者情緒的興奮點，都是能夠使人被他文章「意氣所感」的關鍵所在。

宋人趙彥衛在《雲麓漫鈔》卷八中準確地概括出了唐代小說「文備衆體，可以見史才、詩筆、議論」的典型特徵，而沈亞之小說中表現出來的「構思奇婉」、「能創窈窕之思」，其實質就是一種「詩意化」的藝術特徵，就是對文學作品意境之美的追求和展現。

以上粗略地對《沈下賢集》收沈亞之作品所體現出的一些主要特徵進行了梳理和介紹，正因具備這些特徵，使沈亞之成爲唐代文學史上一位較有鮮明特點的作家。此外，他的作品中有許多在文學理論方面有價值的論述，王運熙、楊明先生編著的《隋唐五代文學批評史》第二編第五節中對此有專節介紹，此不贅述。

《沈下賢集》見諸著錄者，有八卷、九卷、十卷、十二卷之不同，今所傳者，皆爲十二卷本。是書自宋代之後，僅賴鈔本傳世，流佈未廣；且各本間轉相鈔錄，雖有校勘，滋誤不止。今日所存之鈔本、刊本，其祖本實皆一宋代刊本。對於《沈下賢集》的版本流傳情況，近人萬曼《唐集敘錄》一書中有專節論述，考之甚詳。出於對前人心血的尊重，本書對此問題不再贅述，而將其全文收爲附錄，以供有興趣的讀者參考。

近現代，隨著唐代文學研究的深入，對沈亞之亦間有關注者，然大多只限於對其生平事迹、作品寫作年代進行考辨整理工作。主要有近人張全恭作《唐文人沈亞之生平》^{〔二〕}，臺灣學者王夢鷗作《沈亞之生平及其小說》^{〔三〕}，大陸學者李劍國在其專著《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四〕}《異夢錄》節中對沈亞之生平事迹的考辨。其中李劍國先生之作雖然從屬於敘錄《異夢錄》所作的作者介紹，並未對《沈下賢集》中大部分作品進行繫年，但於亞之生平事迹已考辨得頗為精審、完備，糾正了前人諸多錯誤。除以上諸文之外，作為一種資料性的工作，《沈下賢集》卻一直沒有一個完整的校注本整理面世。

筆者自一九九八年起開始留意沈亞之的小說作品，出於對其文字的喜愛，以及自己在研究工作中遇到的種種實際困難，根據自己的切身體會，乃動意校注《沈下賢集》，並開始着手準備。二〇〇三年初，《沈下賢集校注》有幸被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列入本年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計劃，各項具體的校注寫作工作方始正式進行。

鑒于《沈下賢集》現存各種版本中均有這樣或那樣的傳抄訛誤，本次校注乃以①《四部叢刊》影印明萬曆年間翻刻宋本（校注記中簡稱「四部」本）、②湖南葉

德輝「觀古堂」刻本（校注記簡稱「『觀古堂』本」）、③《四庫全書》本（據編修汪如藻家藏鈔本收錄，曾據季滄葦鈔本校閱。校注記中簡稱「『四庫』本」）三種版本為基礎，不以其中的某一種為底本，而是綜合校對各本，參校以《文苑英華》（校注記簡稱「『文苑』本」）、《全唐文》（校注記稱「『全唐文』本」）、《全唐詩》（校注記稱「『全唐詩』本」）中所收錄的沈亞之作品，擇善而從，寫出校記。由於各本之間傳抄互異之處過多，為了方便讀者閱讀，對於一些顯然有訛誤的地方則不出校記而徑改之。此外，亞之是書之書名亦有「沈下賢集」、「沈亞之集」、「沈下賢文集」等不同，本次校注考慮到對集中所收諸種文體的準確概括，故採用「沈下賢集」之名。

對未刊古籍進行校注整理是一項吃功夫的工作，筆者學力所限，儘管勉力完成了對《沈下賢集》的全部校注，但本書之中一定還存在着許多缺失和錯誤，誠心期待專家、讀者的指正。

本書寫就之後，得南開大學文學院李劍國教授撥冗審閱，並提出了大量有價值的修改意見，在此向李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謝。南開大學出版社丁福原先生在責編本書的過程中做了大量辛勤的工作；丁沙鈴、李孟明老師精心進行了裝幀、版式設計，